

朱 姓溯源

朱姓的来源有三支，其一源于上古五帝之一颛顼帝的后裔。颛顼帝玄孙陆终，娶鬼方国君主之女为妻，生六子，第五子名安，赐姓曹。西周时期，周武王分封诸侯，将曹安的后代曹挟封于邾邑，人称邾挟。春秋时期，邾国被楚所灭，失国后的邾国子孙以封地为姓，即邾氏。后又去掉卩旁，改邾为朱。其二源于商纣王的哥哥微子，微子被周成王封于宋，即宋国。战国时期，宋国被齐、楚、魏三国所灭，宋国公族子弟中，有一支改宋为朱。其三源于鲜卑族复姓渴渚浑氏和朱可浑氏。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时，上述两个复姓皆改为单姓朱氏。唐代，散布于江淮地区的朱姓逐渐发展起来，形成了沛国、丹阳、永城、吴郡

钱塘、义阳、太康、河南等九大朱姓望族。

朱姓自古英才辈出，既有文臣武将，又有古圣先贤；既有多才多艺、博采众长的科学家，又有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教育家；既有封建时代的开国皇帝，又有以道学训诲世人的理学大师。汉有朱买臣的负薪苦读，朱云的“折槛旌忠”，唐有武将朱泚、朱温的强梁割据，自立国号。而最为著名的，古代当数宋代理学大师朱熹和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近现代当数民主革命的斗士朱执信和新中国的开国元勋朱德。

朱姓的历史，正是朱姓子孙用自己的脚一步一步走出来的。继往思来，朱姓还将不断涌现出无数豪杰才俊，为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增添无限光彩。

朱姓豪杰

理学大师

朱 熹

朱熹，字元晦，后改仲晦，号晦庵。祖籍江西婺源，出生于福建南平龙溪。他出生时，正巧父亲朱松担任南平龙溪县尉之职，朱熹自幼便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学习儒家经典，十四岁时，师从名儒胡原仲、刘致中、刘彦冲。十八岁中举，成全了其父在世时的心愿。中举人的第二年，又考取了进士，开始了他的宦海生涯。他先后担任过泉州同安县主簿，知江西南康军，知福建漳州，知湖南潭州(今长沙)，断断续续做了十四年下级官吏。三十一岁时，朱熹拜当时理学大家李侗为

师。李侗是理学嫡传，是二程（理学奠基人程颢、程颐兄弟）的三传弟子，因此，朱熹自然成为正宗理学的第四代传人，也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公元 1194 年，经宰相赵汝愚举荐，朱熹入宫担任了南宋宁宗的侍讲。作为皇帝的老师，年纪已然不轻的朱熹终于觉得自己有了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机会。殊不知皇帝并不需要谁来指点他怎样去做皇帝，四十天后，朱熹便因说了不该说的话而被结束了这段短暂的侍君生涯。六十五岁的朱熹回到福建，在“竹林精舍”潜心研读义理。

朱熹一生，经历了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任官十余年，有四十余年从事讲学和著述。即使是在为官期间，他的主要精力也集中于兴学、讲习和读书。他在任同安县主簿时，创办县学，并按学生年龄、资质的差异将学校教育分为“志道”、“据德”、“依仁”、“游艺”四斋，依次从传授理学微言大义的“志道”到断文识字的“游艺”，循序渐进地进行教学活动。同时，他还打破贫富贵贱界线，招收优秀贫寒子弟入学。在知南康军时，他在庐山唐代文人李渤隐居的地方，创立了闻名后世的白鹿洞书院，并在此讲习数年。同时，他还总结了历代贤士关于修身教育的名言，编订了《白鹿洞书院教条》，使书院教育这一形式从我国古代早期的私人授业和私塾的教

育格式中脱胎出来。白鹿洞书院后来成为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而其书院“教条”则成为后世其他书院效仿的条例。在长沙任职时，朱熹还亲自出面，动员有关方面合力修复了岳麓书院。朱熹一生讲习，以弘扬理学为己任，始终不倦，就是向皇帝讲授《大学》时，也不忘掺杂进去自己的理学主张，以致被皇帝认为他过言多事而遭贬。

毕生执著于教育的朱熹，师从一个“理”字。在他的心目中，“理”是万物开始的主宰，是自然界的一切。所有的世间万物，生成于“理”，遵从于“理”，归结于“理”。这种先天存在的、精神的“理”是那么的遥不可及，又是随处可见，时时主宰着人们的生活。他说万物有一“理”，而一物也有一“理”。为了讲得更清楚一些，他采用了古代先贤们在哲学问题上最常用的推理方式，研究出一套以“理”为中心的运行模式来，即

理 → 气 → 物（现世） → 气 → 理

可以看出，“理”是世界运行的主宰，也是世间万物的终结。一切从“理”开始，产生了阴阳二气，生成金、木、水、火、土五行，五行又衍生了世间万物，同时，世间万物无论如何变化又离不开阴阳二气，阴阳二气又复归于“理”的主宰，完成了一个轮回。

朱熹的哲学是入世的哲学，是关于社会发展

和人间万物的哲学，是以人为中心的详密思考和精确研读的结果，这里的“理”又成为人类社会的最高准则，是人类所憧憬所期望的人生最高境界，是精神的“理”。

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先贤之中，他们常常将物质的和精神的境界合二为一，像孔夫子时常叹息的“仁”，像老子津津乐道的“道”等等，些微的区别就在于他们是以人间为中心还是以自然万物为中心的问题。

以人世为本的朱熹坚持不懈地向弟子们灌述着这样一些人生信条：做君王要有君王的样子，他必须是遵守仁义理智信的楷模；做臣子自然有臣子的本份，要遵法守理，敬畏君主，时刻准备为国家和君王尽忠……于是有弟子提问（在朱熹时代，这种问答式的教学方法是最普遍的）：老师，如果是普通人呢？比如父子、兄弟、夫妻……朱熹告诉他们，父母要爱护自己的子女，而子女更要孝敬父母，兄弟相处，要和睦友善，至于夫妻嘛……朱熹觉得如果这样讲解下去，未免太琐碎了些，于是就提高嗓门讲道：万物万事均有“理”在其中，都有主次之分，比如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样社会才能正常平稳地发展。所谓一事一理，这个“理”字你们自己须好好地琢磨，时时去体察。

朱熹始终相信自己的教育会使理学这一自然和人格境界发扬光大，会培养出更多的圣贤。他要求自己以及所有的人“存天理，灭人欲”。一向奉行中庸的朱熹只有在天理与人欲之间作了绝对的对立，可见他对这一问题的重视。他说：人之一心，心存天理时，则不会存人的物欲。当物欲泛起的时候，则天理也就灭亡了。他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使学生做“明人伦”的圣贤之士。他谆谆教导自己的弟子，要依照《论语》中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去学习，要穷尽天下万物之理，并在认清理的本质后做到身体力行。他说，知道“理”却不去亲身实践，那么过去所学习的理，又能怎么验证呢？只不过是白白浪费时间。他又说，学习的实质就是要实践，如果只学习而未有实践，还不如不学习呢。但如果没有明白道理而去实践，又怎么能知道自己实践会有什么结果呢？他要求学生修身要“言忠信，行笃敬”；接人待物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处事要“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他反对呆板单调的科举制度，然而他所编的《四书集注》却成为后世科举的首选必读教科书。

一生躬行讲学的朱熹要求人们自幼便培养孩子们明澄清纯的贤人之气。他要求孕妇们要小心翼翼地培养自己的后代，要睡不侧身，坐不偏斜，

立不跛足，不吃异味之物，不听淫乱之声，不看歪邪之色。专门编写了古代贤人语录《小学书》供启蒙教育之用。

对于自己的学生，他更是严格要求。他说：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心不放在读书上，则眼会看不仔细；心眼既然不专一，就只能粗枝大叶，记忆就不会长久。他要求自己的学生要立志高远，成圣成贤，相信天理自是人间正道，经过不懈的努力和追求，一定能达到理想的境界。

他还要求自己的学生读书要掌握要领，抓住本质，打好基础，举一反三。他说：学习要先理解大的道理，大道理懂了，小道理自然会明白……明白了道理的源头，便像打牢了地基一样，就算是筑起大厦，也不会坍塌。他还说：学习像登塔一样，登一层便知塔之各层的情况，所以虽未上去一层，亦知道上一层的大貌。

他还认为读书其实是很苦很苦的差事，虽不像生离死别那般，却也是披荆斩棘，历尽艰难，尤其是开始。因此，他要求学生一定要认真对待，过好读书开头关。他说，读书的情况，刚开始一本书须费十分功夫，第二本则须八九分功夫，之后须四五分功夫，一直读下去，便会势如破竹，迎刃而解。他在《观书有感》中这样吟道——

昨夜江边春水生，
艤艫巨舰一毛轻。

向来枉费推移力，
此日中流自在行。

他认为读书要到达“中流自在行”的境界，必须付出艰苦的努力，要日常多下功夫。因此，循序渐进、熟读精思成了他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要求弟子读《论语》、《孟子》时，要先《论语》而后《孟子》，读懂一本书再读另一本。在一本书中要按篇章顺序读，即使是一篇文章，也必须每一个字搞清楚含义，每一句话搞明白意思。前边不清楚，决不看后边的，力诫囫圇吞枣，望文生义。同时，他还要求学生要反复练习，熟读精思，做到学习与思考相结合，读书与悟道相结合。他说，大凡读书，要先熟读，使书上每一句话都出于自己的口，然后再深思熟虑，就像书上的话都是出自自己的心中，这样才能有所收获。

朱熹看清楚世间万物皆有一“理”，他希望更多的人通过学习理解这一“理”，感悟这一“理”。他向自己的学生传道授业解惑，要求学生去格物致知，以期达到透过现象看清本质的目的。他认为要获得“真知卓见”须通过格物，即是通过认真研究每一事物的发展，找出内在的规律来。他说，圣人教人，不是去研究一事物，就知道所有的事物，而是要一件一件地去研究。同时，他不愿看到自己的弟子都成为熟诵万卷书的书呆

子，一再强调要在记忆的基础上做到既有广博的知识，又有“理”这一读书了解社会的灵魂，这样才能成为圣贤之人。

朱熹的学说，在他晚年被斥为“伪学”。庆元四年(1198)，宋宁宗下诏要求伪学之徒改视回听，并订立《伪学逆党籍》。列入党籍者从宰相到士人共五十九名，致使朱熹的门人故交都不敢再与他交往。朱熹处于空前孤立的境地，但他仍坚持讲学，直到1200年死时，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1209年，朱熹才被恢复名誉。宝庆三年(1227)，宋理宗下诏，特赠朱熹太师称号，追封信国公，并提倡学者习读朱熹著作。从此，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成为中国的正宗思想体系。

地图学家

朱思本

朱思本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南宋臣民之家，受其父的影响，一心潜心读书，不为功名利禄所动。八岁时，他随父亲到信州（今江西上饶）龙虎山拜见家族姻亲、道教徒张留孙。自此，颇有仙风道骨的张真人便成了朱思本的偶像。十四岁时，他再次来到张留孙真人身边，从此便一心学道，

乐此不疲。

元朝建立之后，为了笼络人心，首先对宗教放宽了政策，推行了一条“凡前代所以为民事神者，有举无废”的兼容并蓄政策，使得各地宗教首领纷纷入朝奉主。正一道教的三十六代天师张宗演曾应召入觐，受皇帝命主领江南道教，徒弟张留孙同期随行入京，被元世祖忽必烈封为上卿，赐宝剑。1278年，又被授为玄教宗师，赐银印。1299年，朱思本奉玄教大宗师之命入大都（今北京）协助张留孙等处理道教事务。二十六岁的朱思本以他聪慧的才智和渊博的学识成为其师得力的助手，曾多次奉旨代皇帝祭祀嵩、衡等名山。二十二年后，朱思本离开大都，先后担任杭州玄妙寺住持提点，龙兴路（今南昌）玉隆万寿宫住持。

由于协助玄教大宗师处理教务的关系，朱思本一生云游了大半个中国。他的游踪可分为两个时期。前一时期主要为游山历水。1299年，他奉玄教大宗师之命，由江西入大都时，离开龙虎山直入浙江，登会稽山后向西折入湖南，游览了湘水、洞庭湖及其周围后，复北上经湖北江陵、襄樊等地，沿淮河经泗水东向，辗转游历了陕西东部、山西、河南以及山东汶、泗、沂、沭等中原大部分地方，最后到达河北、辽宁一带，进入大

都。沿途他注意到各地的山水河流、风土人情、民生休戚、时政得失，以及自然界的风雨雹潮、昆虫草木。但这一时期，尚属于他游山玩水、领略祖国大好风光之时。不过在他的日行杂记中，已然显露出他做为一个地理学和地图学家的倪端。

第二时期是他在 1311—1230 年间协助玄教大宗师处理教务过程中，曾多次奉旨代祀天下名山大川。他从大都出发南下河南，祀祭了中岳嵩山及其道观寺庙，又南行桐柏山，到达南岳衡山的祝融峰，祀祭完毕后又越过南岭，到达广东沿海一带。这一次周游，朱思本不但要代皇帝祭祀名山，而且接受了中朝大夫交给他的“质诸藩府，博采群言，随地为图”的任务。在出发前，他利用自身职务上的便利，查阅了大量前人关于中国地理方面的著述、地方档案材料，以及总志、方志中的有关资料，仔细阅读了《水经注》、《通典》、《元和郡县志》、《元丰九域志》等。同时，在巡游中，他利用一切机会，沿途进行实地测量和考察。通过对当地民间遗留风俗和传说、遗存石刻及古物的研究考察，结合历代文献资料的记载加以筛选取舍，去伪存真，将中国山川地理更加细致准确地记录下来。朱思本在地理研究过程中，本着严谨、细密的治学原则，从不求大求全，如实地记载自己研究的成果，对于一些道听途说

的材料，宁缺勿滥。经过十余年艰苦努力，跋涉奔波，在总结前人记载的基础上，朱思本结合自己实地调查和研究成果，先将全国分为若干个局部，依古法计里画方绘制出若干局部地图，然后将这些局部的地图拼合成长宽各七尺的大图，史称‘輿地图’。朱思本的‘輿地图’是以中原为主体，不包括或者只包括很少一部分诸蕃异域的中国地理总图。图成之后，曾勒石成碑立于上清之三华院。后因战乱，图及图碑均失落。

“輿地图”采用古代计里画方的绘图方法绘制。计里画方是中国古代绘制地图最重要的方法，在现代西方经纬网法未传入中国之前，一直被古代官方、民间所使用。朱思本“輿地图”被罗洪先缩绘增广为“广輿图”并大量刊行之后，这一较好的绘图古法得到发扬光大，成为后世绘制地图的主要方法。不仅官方绘制地图以“广輿图”为主要蓝本，而且民间绘图者也争相效仿，在明清地图绘制史上，形成了以“广輿图”为模式的朱思本系统地图，朱思本本人也成为一位承先后后，起衰振微的地图学家。

“輿地图”是书本知识和实地考察相结合的结合。它首次系统地采用了几何符号，以表示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等内容及相应位置，并且最早确认了黄河河源为星宿海及由西南方向流入该海的

水道。美中不足的是“輿地图”偏重于山川景点的绘制，却忽略了郡县乡镇的相对位置，使得山川位置较详尽而郡县乡镇方位距离不够。

朱思本不仅绘制了“輿地图”，记载了当时中国的山川景物、风土人情，而且经过孜孜不倦的努力，根据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吸收了大量前人的地理知识和流行于当代的新资料，以元代政区为主要框架，编撰了全国统一的国家地理志《九域志》八十卷（今仅存序言和残本八卷），较详细地记载了历代郡县设置、疆域划界等内容，是一本了解元代地理和政区划分设置的经典书籍。

朱思本一生事道，远离宦海俗尘，崇尚道法自然。他卓而不群，知识渊博，是元代一位极其重要的学问家，也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地图学家和地理学家。

“乞丐”皇帝

朱元璋

朱元璋，名重八，又名兴宗，字国瑞。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东）人，出生于江苏沛县，后移居泗州，接着又举家流落到濠州（今凤阳）。少年时曾因生活所迫出家为僧。

朱元璋出生的年代，正是元朝蒙古贵族统治集团对汉族人民实行历史上最严酷的民族压迫的时代。统治阶级将大量的农田改为牧场，使汉族农民和手工业者沦为‘工奴’、‘家奴’。最为残酷的是，他们把全国各族人民分成了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包括西夏人、维吾尔人等；第三等是汉人，即较早被征服的汉人、契丹人、女真人、高丽人等；第四等是南人，即后被征服的南宋时期的汉人和西南各族人民。统治者还在刑律法典上规定了四个等级人的不同权力，如蒙古人可以享受最高的权力，而依次为色目人、汉人、南人。由于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日益严重，激起了各族人民的不断反抗。

1344年春，朱元璋十六岁时，淮河流域久旱无雨，瘟疫四处流行，成群成群的人们不是死于饥饿，便是死于瘟疫。一个村子往往一天要死去十几人，甚至几十人，不到十天工夫，朱元璋家乡附近的村子便人迹寥落，所剩无几了。二十余天后，朱元璋一家八口死了六人，只剩下他和二哥两人。为了活命，朱元璋只好去附近的皇觉寺当小和尚，以便混一碗饭吃。他原以为进庙做僧人，可以读书念经，不用再像放牛娃时受人欺凌。不料那些和尚们却把他当作杂役，每天干各种各样的杂活，吃不饱，还时常受庙里和尚和其它人

的欺负。由于朱元璋生性好强，不愿寄人篱下，刚进寺五十天便被赶出庙门，做起了游方僧人。

在四处云游过程中，朱元璋先后游历了合肥、六安、庐洲、固始、汝洲、颍洲等地，前后历时三年。他一路求缘化斋，风餐露宿，走遍了淮西的山山水水，接触了社会的方方面面，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更重要的是，河南和淮西是当时中国南北两大派白莲教活动的中心。北方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和南方白莲教首领彭莹玉，积极利用传教活动，宣传‘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也就在此时，朱元璋接触了彭莹玉、刘福通等人，接受了新的思想和宗教信仰。此时的朱元璋曾留诗一首：‘天为帐幕地为毯，日月星辰伴我眠。夜间不敢长伸腿，恐把山河一脚穿。’充分表现了他推翻元朝统治的理想和抱负。

1351年，朱元璋回到皇觉寺后不久，全国反元大起义爆发。次年，已经加入秘密组织的朱元璋投奔了已在濠州（今凤阳）起义的郭子兴，他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勇敢果断，由最初的亲兵不久便升为郭子兴的亲兵九夫长。此后他又亲自回乡募兵七百余人，到1354年，就扩展到二万余人。由于他在军中办事小心谨慎，又敢作敢为，行为迅速，从不误事，打仗时又能身先士卒，才略过人。很快便被郭子兴视为心腹，

入伍仅三年便成为义军中举足轻重的人物。郭子兴还把自己的养女许配给了朱元璋。1355年，郭子兴委派朱元璋为和州总兵官。这一年夏天，郭子兴及其儿子郭天叙先后死去，朱元璋便成了这支起义军的元帅，时年二十八岁。三年后，朱元璋攻占南京，继而向徽州进军。他采纳儒生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不动声色地扩张着自己的实力。直到1364年，消灭了陈友谅，在江南诸雄中已无敌手时，才称吴王。

朱元璋卓越的军事才能得以淋漓尽致的展现，是在消灭陈友谅集团的鄱阳湖水战。当时，陈友谅拥兵六十万，楼船数百艘，企图一战消灭朱元璋。而朱元璋此时只有二十万兵力，更没有能抗风浪，打大仗的楼船。但是，朱元璋指挥下的军队却骁勇善战，士气高昂。他发现陈友谅的战舰全都用铁索相连，虽然显得气势庞大，却缺乏灵活机动性，便出动小船冲向敌舰，乘风纵火，烧毁了数十艘敌舰。朱元璋本人也亲自督阵，临危不惧，最终取得了鄱阳湖大捷，成为中国古代战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典范。此役奠定了他统一南方的坚实基础。

在统一南方之后，朱元璋又挥师北伐向元朝统治发起了最后的攻击。北伐之初，他即制定了先取山东，占领河南，攻克潼关的外围作战方